

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李新魁

闽方言是我国汉语所属的七大方言之一。它主要流行于福建省。广东境内也有许多地区使用闽方言。广东的闽方言可以分为三个支系，一是流行于粤东地区韩江流域的潮州话；二是流行于海南岛上的海南话；三是流行于粤西地区雷州半岛上的雷州话。这三种话使用的人数共在两千万人以上，占广东省总人口约五分之二。是广东省内的一种重要方言。

潮州话、海南话、雷州话都是从福建的闽方言分化出来的。由于它们分化的时代和过程以及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各不一样，所以形成后代相近而不相同的三支方言。这三支方言在历史上与福建的闽方言（或称为闽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要了解和研究这些方言的有关情况必然要涉及闽语。福建的闽语还包括福州话、厦门话等方言支系，它们与广东的闽方言相近而不相同。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源头，但也有不同的历史发展线路。下面，我们着重探讨广东境内这三支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 福建闽方言的来源

广东境内的几种闽方言是从福建的闽语分化出来的。那么，福建的闽语又是从什么方言、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分化出来的呢？过去，一般的说法是：闽语主要是晋代中原地区离乱之时，中原汉族人民南下带来中原汉语演变而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近若干年来，国外、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闽语与华东地区上海、苏州一带的吴语有密切关系的看法，认为闽语是由吴语分化而来，或者说后代的闽语就是古代的吴语。如美国学者罗杰瑞就在《闽语里的古方言字》一文（载《方言》1988年第3期，译文载《韶关师专学报》1988年第3—4期，余伯禧译）中说：“闽方言是古代南方汉语变体衍化而来的”，“在闽语中最古老的词汇层在许多方面脱离《切韵》音系这个事实，是闽语作为《切韵》前的吴语或者是江东话身分的进一步证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的闽语，就是《切韵》（作于公元601年）之前的吴语（那时的江东话也属吴语）演变而来的。又有人认为：“闽语的产生应始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经浦城入闽之时。”（见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闽语是在

三国时由吴语（东吴的汉人用的是吴方言）分化出来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呢？闽语是不是从吴语分化出来的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

我们认为，广东闽方言的“近祖”是福建的闽语，而“远祖”是江浙一带的吴语。但闽语不单是从吴语分化而来，分化的年代也不是在三国或六朝时期。就其来源来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古代吴越语的遗存，同时也吸收了流行于湖北、湖南、安徽一带的楚方言（楚语）的某些成分；第二，直接、间接地接受了中原汉语相当重大的影响；第三，包含有土著民族（百越的一支“闽越”）所使用的语言（现代学术界称为“古台语”）的某些沉积成分。就其分化的时代来说，至少也可以包括三个时间层次：第一，先秦至三国东吴之前。闽语逐渐从吴语分化出来，应在这一个时期之内。第二，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闽语与中原汉语发生融合，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时期。第三，唐宋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接受中原汉语书面语和读书音更进一步的影响。广东各闽方言从福建闽语完全分化出来，主要是在这第三个时期。这三个不同的时间层次和三种不同的语言来源，在广东闽方言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交错在一起。各种不同的来源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层次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经过一两千年的演变，终于形成广东境内三支相近而不相同的、相当独特的方言。

二 福建闽语从吴语分化出来的过程

在先秦时代，从江苏、浙江至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聚居着一个总称为“百越”的部族群。在江苏的称为扬越，在浙江的称为瓯越（浙江南部的又称为东瓯），在福建的称为闽越，在广东的称为南越，在广西的称为骆越，在云南的称为滇越等。《汉书·地理志》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春秋时代，在江苏和浙江地区，曾经建立过两个强大的诸侯国，一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吴国的统治者，据史书的记载，本是周族人，是周文王、武王等的同宗。而这个诸侯国的广大百姓，却是越族人。历史记载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道他们的父亲想传位给他们的弟弟季历，便故意避开逃到东南的梅里（现江苏省无锡县东南）。他们到了吴地之后，便有当地的少数民族“荆蛮”千余家前来归附，他们相继做了蛮人的君长，称国号为吴。在周朝时，吴长期作为楚的属国，臣服于楚。到了吴王寿梦时，吴国逐渐强大。这时，吴国的百姓已逐渐接受中原的华夏文化。在寿梦统治吴国时，吴人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特别是晋国往来甚为密切。公元前568年和前559年，晋国曾两次与吴国结成联盟企图攻楚。吴国在长期臣服于楚国时，就已间接地从楚国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和直接接受楚文化的影响。而在与晋国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更进一步接受华夏文化及语言的影响。寿梦的儿子季札在公元前545年曾经聘问过鲁、齐、郑、卫、晋诸国，表现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而齐景公也曾把少女嫁给吴国国君阖间的长子终余；另外，孔子的弟子言偃（子游）就是吴国人，他也接受中原的文化。这些事例说明吴国

与中原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吴王阖闾时,用楚亡臣伍子胥为将,大举攻楚,吴人五战五胜,伍子胥终于报了楚王杀死他的父亲伍奢之仇。这个时期的吴、楚之战,促使吴国通过楚方言大规模地接触汉语。必须指出,在吴、楚争战之前,楚国对吴越地区的文化和语言已经有很深的影响。楚国的主体民族,本来也是少数民族(相当于现代的苗、瑶等族),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华夏化较早,在周代初年,楚人已逐渐接受华夏族(华夏族是由黄河流域各族逐渐混合而成)的文化和语言,楚语成为华夏语的一支方言。楚王熊渠在位时,为了取得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人的支持,对越人采取了许多优待的政策,加强了与吴越地区的交往,所以《史记》说过这样的话:“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因此,早在春秋之时,楚国的方言对吴越地区就产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吴方言中吸收了许多楚语的成分。所以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现代吴语的类型学》一文中说:“跟吴语区人民最有密切关系的是古代百越人民……苗瑶族应该是其中之一。从吴语音韵系统看来,很多地方类似苗瑶语……我们认为古代吴语区的人民说过象现代苗瑶语那样的语言。”苗瑶族是楚国的主体民族之一,楚语中就吸收了许多苗瑶语的成分,而吴语又表现了许多与苗瑶语相同或相近的特点,这就表明了楚语对吴语曾经有过相当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楚地的土著民族与吴地的土著民族本来可能就是同一民族,即苗、瑶等族(古称为蛮),他们语言的“底层”本来就非常相近或相一致。总之,楚语对吴语在先秦时代就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所以汉代扬雄所写的《方言》一书中,就常常“吴楚”并提或“荆扬”并提,这就是因为这两种方言有其近同之处。

越国处于吴国的南部,其土著民族与吴很接近,越国统治者的先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述,说是夏禹的后裔,夏后少康的庶子,开始时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号为无余。据此,越国国君也是出于中原大族之后。而越国的百姓也属于越族的一支,有人说吴与越的百姓本都同族、同俗。春秋时,越国的文化要比吴国落后。楚灵王时(公元前540—529年),越与吴一样,都归楚国统治,是楚的一个属国。春秋末期,吴越之间发生战争,越王勾践先是被吴国打败,后来在谋臣文种、范蠡的辅助下,终于打败了吴国,国势强盛起来,越兵横行于江淮之间。后来,楚怀王灭掉了越国,又臣服于楚。

在吴、越立国之时,两国的主体民族本就比较接近,而在它们发生争战的年代,其民族及语言的融合也相当剧烈。到伍子胥辅吴时,吴、越两国之民所操的语言可能已经十分接近或相同。《吕氏春秋·知化》谈及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话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也有类似的说法。总之,吴与越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相同或比较接近的。所以汉代扬雄的《方言》常常把吴越并举。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语言可以合称为“吴越语”,这个吴越语,也就是后代所称的吴语,它属于汉语(上古时称为华夏语)的一支。不过,使用吴越语的,主要还是朝廷中的官吏和都邑中的居民,郊野之间的老百姓则还是使用原来的民族语言。如越国的“山越”或“外越”直到后代还是使用

本民族的语言。

福建的闽族属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归越国所统治，有时候也臣属于楚。闽越人本来所操的语言，都是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与瑶语及苗语比较接近），它与北部的扬越、瓯越不论在种族或语言上都很近似。越国建国时，加强了对闽越的统治，不断有越人进入福建，吴越语也不断传入闽地。因此，在战国以前，闽人可能已经接受了吴越语相当重大的影响。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的时候，秦将王翦等人平定了楚国所领有的江南之地，原为楚人所灭的越国也落入秦人手中。秦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公元前221年，秦军征服了东瓯（在浙江南部）、福建一带，在这些地区设置了闽中郡。自此之后，越地人民又进一步向南迁移，这就为闽语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入汉以后，闽越人曾帮助刘邦抗击项羽。而且，在汉朝时，闽越曾被封为王国。《史记·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皆庆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羽，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祖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浙南温州一带就是东瓯的封地。这段话说明闽越及东瓯的王族，本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由此可知，闽族的民族及语言跟吴越本就有密切的关系，而在汉初时，闽越及东瓯都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活动，与中原发生了接触和交往。

汉景帝三年，被封于江苏、浙江等地的吴王刘濞造反，他强迫闽越王跟他一起反汉，闽越不从，东瓯王则跟他一起反对汉室。到了吴被攻破时，东瓯王又杀死吴王以邀汉赏，“以故得不诛”。吴王的儿子驹逃到闽越去。他怨恨东瓯王杀死他的父亲，鼓励闽越进攻东瓯以报私仇。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王发兵围东瓯，东瓯人向汉天子求援。汉室朝廷派严助发越地会稽郡的兵卒渡海往救。汉兵未至，闽越的军队已经离开。结果，东瓯人“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又发生了闽越出兵攻打建瓯于番禺的南越的事。汉朝皇帝派大将王恢到南方来讨伐闽越。闽越王郢发兵拒险对抗。结果，郢的弟弟余善杀郢投降。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南越反汉，“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辞，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杨）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不许。”（见《汉书》）。六年，韩说、杨仆分两路进攻东越，“军吏皆在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地遂虚”。在汉初的各处战争中，东瓯及闽越一带的居民与中原军队屡有接触，而且在汉武帝时曾两次迁至江淮之地。这就为闽越居民与楚地及中原居民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福建的居民在此之前及这个时代，深受中原及楚文化的影响。1960年以后，在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现了九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出土的文物带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的特征。此外，在福州、崇安角亭等地，也发现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汉代环首刀及大量五铢钱。这表明在西汉之际，闽地已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当然，闽地在汉代仍与吴越发生密切的关系。《宋书·州郡志》说：“汉

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冶县指的是福州一带，在汉时仍属会稽郡的控制，仍然离不开吴越的影响。

三国时代，孙权在吴地立国。东吴的势力不断向南面闽越地区扩展。孙权为了扩大兵源和搜掠劳动力，也为了镇压对这种掠夺的反抗，曾发动几次对居于浙江、福建一带的“山越”人的围剿。经过三年的战争，十万山越人被迫投降。孙权把强壮的（约四万人）补充入军队，其他羸弱的分赐给功臣及豪强作为佃户。这样做的结果，便加强了汉人与山越人进一步融合。由于杂居的结果，又把当时的吴语传入闽越较为僻远的地区。另外，东吴提倡屯田，设有屯田兵，又使士兵兼作手工业，有所谓“作士”的人，屯兵与作士驻居各地，他们对吴语的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在汉代以前，闽人主要是接受吴国和越国的统治，接受吴越语的传播和影响。同时，闽语又吸收了楚语的若干成分（吴、越、闽都曾长期臣属于楚）。此外，还有闽地本民族语言的沉积成分，这些都融合在闽方言之中。现代的闽方言有较为明显的两种读音的差别，一是说话音，一是读书音。前者保存了汉代相当大量的语言特点和汉代的词语或特有的词义，这些是三国以前吴越语的遗留。后者则保留六朝及唐代的语言特点及词义较多，其语言时代显然较为后出。现代的闽方言词，不单在基本词汇方面与吴语相同或相近，而且在某些特殊用语上也相同或相近，如扬雄《方言》中谈到吴越方言词“泡”（盛）、“抱”（“伏鸡曰抱”）、“路”、“陂”（斜）、“揜”（藏）等，都与闽方言相同。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一文（载《方言》1979年第3期）中考出的古吴方言词，绝大多数也与闽方言相同，这些都可以证明闽方言与吴方言关系的密切。同样，在汉代扬雄《方言》中所举的楚方言词，仍有许多保存在闽方言之中，如“睇”（看）、“蜀”（一）、“擗”（取）、“纫”（缝）、“婣”（美）等。这也说明闽方言中也吸收了许多楚语的语言成分。总之，三国以前，闽语主要是由吴语向南传播衍变而来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楚语和中原汉语的要素，此外，还有本地民族语言的沉积成分。这几个方面，汇合成三国以前的闽方言。换一句话说，在魏代以前，闽语便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直接来自吴语。吴语在南北朝以前虽然历经变化，吴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因人口的迁移也有相当大的变动，但三国以前的吴语，却大体上保留于闽语之中。后代的闽语，其基本面目，事实上应该就是三国以前的吴语。所以我们说，广东闽方言的“远祖”就是吴语。

三国之后，晋朝统一了中国。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中原地区动荡了一百多年，大批中原居民流入南方。吴方言区本身由于大量北方流民的迁入，吴语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它的面貌，已非三国时代以前的状况。三国之后，吴语当然继续对闽语产生影响，仍有吴人不断进入闽语地区，但从各方面的材料看来，这一时期，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已经不太大。美国学者罗杰瑞从晋代郭璞注《方言》及《尔雅》时提及当时的江东话（属吴语）的一些词语与闽语相同，从而论证闽语是在晋代之时从吴语分化出来。他举了十四个两种方言同用的词（如“械”——瓢、“碗”——袖子、“瓶”——水缸、“簟”——竹席、“蝇”读如羊的音、“藻”——浮萍、“虬”——水蛭、“健”——小鸡

等)作例子,这些例子当然有一定的证明力量,但我们把郭璞注这两部书时谈及的江东方言词一百多条和闽语作一比较,发现除上举十多条两者一致之外,其他大多数词语两种方言并不相同。这种情形,说明晋代的吴语对闽语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已没有绝对的承传关系。闽语从吴语中分化出来,应在这一时代之前,而不是在晋代中原离乱之时。因为晋代的吴语,已不全是汉代以前的吴语。吴地的居民已混入大量的北方居民。所以马瀛《国学概论》认为中原古语至晋代及刘宋时已输入江东,郭璞时代的吴语已不同于扬雄时代的吴语。郭璞所提及的江东方言词,有许多与中原地区的宋、魏方言相同,它们是来自中原汉语。晋时南来的北方人,他们带来的中原词语已大量地杂入吴语之中。吴语已非昔日之吴语。所以,罗杰瑞先生的结论不完全对。闽语之从吴语分化出来的年代,要在晋代以前较为古远的时期,起码是在三国以前。

晋时的中原大动乱,使北方汉人大量地进入闽语地区。据唐人林谿《闽中记》的记述,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郭四姓先入闽。”明朝何乔远的《闽书》也说:“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建安志》说:“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谈。”这个时期,闽语继续接受来自吴语和中原汉语的影响。但也正在这个时期,闽语已经形成,而且保持着三国以前的语音特点而没有多大变异。这与吴语的发生剧烈变化,语音系统及词语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自魏晋以后,僻处福建的闽语已离开吴语而形成一支独特的方言,至唐宋时已颇为入知。如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说:“闽人谓水母曰訝”;唐代诗人顾况也用闽方言词“团”(儿子)作了一首很著名的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及欧阳修《归田录》都谈到闽人刘昌言操闽语的情况;宋曾慥《类说》也说到闽士以“何”字与“高”字押韵(刘攽《贡父诗话》说“闽人以高为歌”),宋代韵书《集韵》也在“林”字下注曰:“之谏切,闽人呼水也”,等等。这些都说明唐宋之世,闽语已形成一支颇具特色、为其他地区汉人所瞩目的方言。

唐代以后,福建的闽人大量地向广东地区迁徙,这又造成了闽语的分化,促成广东各种闽语方言的出现,这便是潮州话、海南话和雷州话产生、发展的历史时期了。

(待续)

本文责任编辑 庄容开